

一、绪言-国父确是一个大军事家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国国民党的手创者,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建设者-国父孙中山先生,向来一般人都一致推崇他为现代中国一个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却很少认识他也是一个大军专家,在遗教中建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战争理论.这个整理和阐扬的任务,正待我们今日来把它完成.

国父一生虽没有机会进过军事学校,却常和军事专家研究军事,并自修古今中外的兵书,尤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在西医学校时代科学修养的精湛,更助他成为一个大军事家的所在.国父原是爱好和平的,但为完成国民革命,不得不采用战争手段,亦即“革命的手段”一个健全的革命领袖固要擅长政治,亦须兼长军事.退一步说,纵不一定要有用兵的天才,起码亦需懂得军事.

现在我们研究国父的革命战理,首先应知道国父研究军事及指挥军队的经过实情,因为这是国父成为一个大军事家的所在,亦即国父战争理论的渊源.

一、国父研究军事的经过

根据我们的考证:国父的研究军事应溯源于太平天国灭亡后十年,国父十一岁在村塾读书时,村中有一个太平天国的遗兵,常到塾里为学童讲述洪杨革命的故事,国父听得,深慕洪秀全之为人,推翻满清之志,不禁油然而生,遗兵对国父特加爱许,一遇无事,便和国父详谈当年战事,如洪秀全怎样起义,怎样从广西打到湖南,打到武汉和南京等等.并以洪秀全第二勉国父,国父得此徽号,引为无上荣耀,亦辄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国父自决心致力革命之后,对于军事学术即特别留意,一八八七年(丁亥)入香港西医书院研习医学,常置巨幅中国地图于楼壁,对之而筹思攻守之方.此为兵要地理研究的开始.又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昕夕往还,亦常研究军事问题.一八九四年(甲午)北上上李鸿章书,并“游东北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自传”)此为政治军事的实际考察.

一九〇三年(癸卯)夏,国父由安南东渡日本,致力外交活动,结识日野熊藏少佐,日野留英多年,为日本军事专家,以研究南非洲波亚人(注一)抵抗英军所采用的散兵战术,及发明日本式盒子炮,闻名于时.国父认此种战术最适用于揭竿起义的中国革命军,乃与日野研究,除笔记其口述外,并购置英文的英波战史及图书百数十卷,日夕观摩,孜孜不倦.同时为实施同志以军事训练,又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延聘日野为校长.小室健次郎大尉为助教,学科除普通兵学及制造盒子炮炸药外,尤注重波亚人散兵战术的传授.第一期学生共十四人,开课之日,国父亲临致训,听者深受感动.至于国父当时为推翻满清,在粤桂边境及各地所组织的革命军或称“民军”类似今日的游击队,战鬪所用的战术,即是散兵战术(亦称“波亚战术”).往后国父于民元发表“钱币革命通电”曾暗示采用散兵战术以抵抗帝俄.迄民十于一“军人精神教育”的讲词中又主张采用游勇战术(即散兵战术),以与北方军阀交战,可见国父对散兵战术的心得,及起义军事所受散兵战术的影响.

国父的学问博而精,对古今中外有用之书,无所不读,兵书尤为爱好.加以他的虚怀若谷,又常与外国军事专家,像上述的日野,便是其一.此外还有美国“天下最杰出军事家”堪马利将军(注二),俄国嘉伦,李糜及英德法将校多人.

国父对普通军事书籍,如典范令及各种教程,莫不熟读.在“民权初步”的自序中曾提及步兵操典说:“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浏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军人精神教育”里亦提及游勇战术的伏击技能”与操典中所谓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对于外国军事名著更为爱读,据一位老同志最近给我的信说:“总理所读各国兵书,以德著英译为多.据言:军事学以德著为第一.”又说:“总理对外人用兵者最崇拜拿破仑,书架上满置各国名人关于拿翁之著作.癸卯年(民前九年)曾语人谓:拿翁韬略,百年后始大放光明,盖欧人研究拿翁战略之佳本,多出版于百年以后也.总理对拿翁每次战役,皆了如指掌,有条不紊,据言:诸役以攻奥一役为最神妙,于战史上最有价值.”(注三)其对于我国古代各兵家兵法,亦有精湛研究,就中以孙子兵法为最.曾评该书说:“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民权主义”第一讲)又对同志说过:“拿破仑的作战,深得孙子的蕴奥.”(注四)原来拿翁在欧陆作战,阵

中常披阅法译孙子兵法. 当对同志讲解太平天国战史及其他攻守之事, 辄引孙子的原理原则来说明, 有时并很详细地指出那原理原则见于孙子兵法中第几篇第几页第几行. (注五)

此外, 国父于各种演讲中常喜以军事为喻, 他说: “不像兵船操典, 过了十年, 便成无价值的废物.” (“民权主义”第五讲) 又说: “譬如练兵打仗, 便要用军事家.” (第六讲) 又说: “亦犹之军人上阵战争, 必须明白其枪炮之效力, 及其用法. ……譬之军人提枪射击, 若命中, 其人必死, 否则亦伤.” (“军队战胜与党员奋鬪”讲词) 又说: “这次的大会 (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浴日注) 好像是一个大军事会议, 定了种种作战计划, 下了许多攻击命令, 交各将领带回去实行作战一样. 又好像是一个大兵工厂, 制了许多枪炮, 出了很多子弹, 诸君在此领了很多枪炮子弹, 回到本地地方去, 便要分给到各位同志去补充他们, 各位同志得了补充, 便要他们实行攻击, 不可空耗了这些补充, 到了实行攻击的时候, 必须审察敌情, 临机应变, 对于敌人要能够收效, 那才算是不枉费了这补充.” (“党员之奋鬪同于军队之奋鬪”讲词) 于此, 亦足见国父对于军事的兴趣与研究.

二、国父指挥军事的经过

国父致力革命, 认为欲扫除革命的障拟, 不是单采取和平手段所可完全奏效, 必须假以军政时期, 断然采取战争的手投. 在历史上, 像我国的汤武革命, 美国的独立运动, 法国和俄国的大革命.

国父于一八八五年 (乙酉) 中法战争结束之时, 即决意致力于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 正如自传所述: “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 以医术为入世之媒.” 而首先采取军事行动, 以图推翻满清, 系肇端于一八九五 (乙未) 广州之役 (第一次起义). 如自传说: “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 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 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 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 有邓荫南, 杨衢云, 黄咏商, 陈少白等. 而助运筹于羊城为机关者, 则陆皓东, 郑士良, 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 予则通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 惨淡经营, 已过半载, 筹备甚周, 声势颇众, 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 乃以运械不慎, 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 事机乃泄, 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 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 同时被株连而死者, 则有丘四, 朱贵全二人, 被补者七十余人, 而广东水师统帅程奎光与焉, 后竟病死狱中, 其余之人或囚或释. 此乙未九月九日, 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

也。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出至香港。”这一役，国父是在广州亲自指挥的，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军事的光荣记录，虽不幸失败，国父的英勇已可概见。

自此而后，国父更积极地策划军事的进行，由他直接发动同志起义的，有一九〇〇年（庚子）惠州之役（第二次起义），一九〇七年（丁未）潮州黄冈之役（第三次起义），惠州七女湖之役（第四次起义），钦廉之役（第五次起义），镇南关之役（第六次起义）及一九〇八年（戊申）钦上思之役（第七次起义），云南河口之役（第八次起义），就中惠州之役，国父由日本到台北，（按国父到台北共有两次，此为第一次，尚有一次在民国二年），亲自策划，一面令郑士良在惠州起义，一面就地加聘军官备用，依国父的计划，惠州的革命军要沿着海岸向东推进，以厦门为目标，国父则由台渡海，亲临督战。旋因日本政变，计划遂遭破坏，但台湾在中国革命史上已写上光荣一页。钦廉之役，国父派王和顺率领二百余人破清兵于王光山，当时安南的法文报纸曾论此役说：“此次革命革，不知用何战术，能一战而去清兵四分之一，可称奇捷。”尤以镇南关之役，国父亲临督战，以一当十，更表现了革命统帅的英勇和伟大。

镇南关是桂省南部的一个要隘，向有“第二旅顺口”之称，这一役可以称为小规模的要塞战。国父当时欲夺取镇南关，以壮革命声势，乃派黄明堂于十月二十六日率领百余人袭取该关。当将所有镇中镇南镇北三座炮台完全克复。国父在河内接得捷报，兴奋异常，乃率同黄克强，胡汉民，胡毅生，及日本志士池亨吉（新闻记者），法国退职炮兵上尉（佚名）等，于二十九日从河内搭乘火车直达同登站（距镇南关只有数里）下车步行抵关，时已入夜，当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防御计划，并指定何伍坐守镇南，李裕卿坐守镇中，自己与明堂，克强等坐守镇北，检查所俘战利品，为数无多，不足以增强我军的战斗力。而清军陆荣廷等却率二千余人浩浩荡荡地来围攻。国父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沉着指挥守军抵抗，又亲自督率法国炮兵上尉发炮，轰击敌阵，使敌人不敢仰攻。措因众寡悬殊，未能由守势转为攻势，给敌人以包围歼灭。到第二天国父为遄返河内，筹款购械，以图大举，便偕同行者乘黑夜绕道下山。惟仍令明堂等继续抵抗，因粮尽弹绝，及活跃于十万大山的友军道远不能来援，一直抵抗到十一月四日，才突围而出。（注六）

可是,上述各战役,在军事上,虽然收效甚微,在政治上,却得到伟大的成功,震撼鞑虏的心胆,树立大汉的声威,造成革命的时势,促进全国各地的起义.然而国父愈挫愈勇,再接再厉,虽以清廷的严缉,远避海外,乃命国内同志到处发难,于是便有一九一〇年(庚戌)广州新军之役(第九次起义)及轰动全国的一九一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第十次起义),因而促成是年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国父在海外闻讯,奔驰回国,各省代表于十一月十日齐集南京,选举国父为临时大总统,民元正月一日宣誓就职.这时清帝溥仪,仍负隅北京,国父毅然主张用武力澈底解决,积及进行北伐军事,每召集各军将领指示机宜,置地图于桌上,按图指示,如何进军,如何攻守,均合用兵原则,并强调革命军不怕武器的拙劣,只要攻击精神旺盛,便可以寡击众,百战百胜.起初一般将领以为国父没有进过军事专门学校,不懂军事,及至领略这一番训示后,大家都深深地佩服他兵学的精湛,尤佩服他那种审愤而虚心的指示态度,这是一位亲历其境的老军官告诉我的(注七).至于决定的北伐计划:“现在用兵方略当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巢.”(“覆黎元洪指示北伐方略电”)这时由津浦路前进的北伐军,所向无前,连战皆捷,初次粤军姚雨平及苏军合败敌军张勋于固镇,敌方增援而来,战于南宿州,又以姚军及淮军陈干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张勋等只得放弃徐州,各路亦正谋分进合击,直捣幽燕.清廷见势危急,授权袁世凯议合,同时我方主和者亦居多数,遂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中止北伐军事.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国父首次指挥军事的经过.

可是满清虽告推翻,而继满清之后的封建遗孽及反革命势力,却此仆彼起,变本加厉.国父目击心伤,认为职责所在,非重整旗鼓,继续讨逆不可.十余年间,由讨袁之役(民二及民四两次),而护法之役(民六声讨冯国璋,段祺瑞),而讨莫荣新之役(民九),而讨陆荣廷之役(民十),而讨陈炯明之役(民十一至十三),而讨沈鸿英之役(民十二)及削平广州商团之变(民十三)等,就中除讨袁之役,避居日本,遥为指挥各省同志起兵讨伐之外,其他战役均以广州为根据地,就近指挥.在这个时期,国父于民六被选为海陆军大元帅,民十被选为非常大总统,每次均揽党政军的大权.民十二由沪重返广州主持讨陈,因各将领之推戴,又暂就陆海军大元帅职.可是国父原以贯彻护法,实现国家统一及完成国民革命为职志,自

不能局促于南力一隅，亟宜兴师北向，铲除北洋军阀。因此国父先后在广州发动了两次北伐：第一次在民十一年，国父于民十以两广底定，亲至桂林，整理军队，准备于十一年春督师由桂取道湖南，大举讨伐非法总统徐世昌及直系军阀。不料，北伐军于是年初陆续出发到达湖南边境时，陈炯明竟在后方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既断绝北伐饷械的接济，且从而阻挠北伐军的前进。国父不得已，由桂班师返粤，罢免陈炯明职务，改道江西北伐，于是年五月六日亲临韶关誓师。这次作战计划：第一期夺取赣州，第二期夺取南昌九江，义师所指，节节胜利，经将赣州克复，北伐军前锋到达吉安泰和，但又因陈炯明在后方捣乱，嗾使部下围攻总统府，只得回师靖乱了。第二次在民十三，国父以曹琨，吴佩孚朋比为奸，毁法祸国，遂于九月率师重莅韶关，发表宣言，檄告天下，名正言顺，声威大震。旋以曹吴倒塌，及北方国民军领袖诸同志纷电入京共商国是，国父应召离粤北上，改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纠纷，遂中止北伐。

国父于讨贼各役中，以指挥讨伐陈逆之役，其沉着大胆，刚毅果断及机智，比之中外古今的名将，毫无逊色方，洵为我国今后军人的楷模。却说国父因陈炯明的阻挠北伐，由桂返粤，乃免其粤军总司令及省长兼内务总长等职，念其前劳，冀能悔过自新，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旋为利于北伐起见，复畀以办理两广军务，而陈却野心不死，竟愈演愈凶，于民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嗾使部下叶举围攻总统府，欲置国父于死地，实现其独霸广东的阴谋，国父当时接得这个谋害的密报，在叛军的刀光剑影中，从容退入楚豫舰，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以为纪念），便造成“广州蒙难”的一幕，这和“伦敦蒙难”同样的悲壮险绝，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两大奇迹。

国父登舰后，即召集各舰长商议应变戡乱的策略。这一役就海军作战说：假如海军力量强大的话，就应使陆战队单独登陆，占领据点，进击敌军。反之海军力量薄弱，不能单独登陆作战的话，就应发挥炮火协同陆上部队，夹击敌军。国父当时因海军陆战队，力量很小，只得采取后一策略，一面令卫戍总司令魏邦平率所部集中大沙头，策应海军进攻陆上叛军，一面亲率坐舰永丰及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等舰，于十七日由黄埔出动，经车歪炮台驶入白鹅潭，炮击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等处叛军，各弹多中标的，叛军闻声落胆，纷纷弃械逃遁，死于炮火之下者达数百人。惟因陆上部队，未能如期发动

策应,炮击之后,叛军仍散而复聚,其乱未获平,然已足表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致本党同志书”)

国父见情况如此,遂率各舰驶回黄埔镇守,这时各舰舰长均主张舰队移往西江.国父却认为只有袭取车歪炮台,驶进白鹅潭,等候北伐军回师夹击,较为得计,旋于七月十日文亲率坐鉴及楚豫,豫章,广玉,宝璧等舰,从海心冈驶往三江口,向车歪炮台轰击,叛军亦发炮还击,一时炮声震天,双方均有损失,各舰舰长目击叛军炮火占优势,畏缩不敢前进,国父以身作则,令座舰驶于先头,一致攻击前进.而叛军在该炮台两岸布置野炮有二营之多,一见舰队驶近,便构成交叉火网,实施封锁射击,歼灭射击,弹如雨下,各舰均受微伤,坐舰连中六弹,官兵死伤十余人,国父一面指挥各舰作战,一面观书舱内,雍容镇定,大有古代儒将之风.正如国父说:“此役也,以兵舰数艘,处叛军四集环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进至省河,以慑叛军之胆,而壮义士之气,中外观听,亦为之耸.”(“致本党同志书”)国父在白鹅潭,一直支持到八月九日,见李烈钧,许崇智等北伐军回师讨逆的失利,认为孤守省河,于事无济,方离粤赴沪,再图讨伐.于此,值得大书特书的,当坐舰寄碇白鹅潭时,陈逆曾运动海军发动叛变,以威胁国父,施放水雷鱼雷,以谋害国父,遣派飞机,盘旋于坐舰之上,以恐吓国父,又用民船钢板小轮及敢死队,图袭国父战舰,这时全体官兵均惊惶失色,国父却屹然不动,这是由于秉持“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总统为民国而死,分所应尔”,“我辈既为国牺牲,当置死生于度外,方寸既定,逆军其如予何?”(注八)的伟大精神所致,这种精神,正和英国海将纳尔逊于伐拉加的大海战中,身为敌弹所伤,仍负伤指挥,直至绝命为止的精神,先后辉映.

让我于此补述国父对于海军的研究:国父对于往昔水战上所谓“风沙水线”的知识,无不通晓(注九),对于英美各国出版之海军名著,无所不读.据说:每年都订有英国海军年鉴,常置案上,以供参考,并屡对同志详论海军在国防上的重要性(注十).像在这一役中,当肇和,海琛,海圻三大舰为陈逆运动,驶离黄埔时,叛军以为这三大舰他移之后,则国父所停止在黄埔各小舰,均在鱼珠炮台监视之下,并为黄埔后方的海心冈,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舰必不能通过,那不为鱼珠炮台所轰毁,亦必为其所封锁,任凭为所欲为.却不知道国父对于海图,了如指掌,他为应付这个突变,即派员往测该处河水的深度,一听得水深达十五呎的报告,私心大喜,叹为果不出所料,立即督率各舰从黄埔上游,经海心冈驶出三河口,

绕道驶往新造村附近,使叛军无所售其奸.这一个断然的处置,使全体海军将士,为之心折,就是叛军方面,也深惊其神算.至于对各舰舰长主张舰队不可移驻西江,列举五大理由:(一)以西江水浅,各舰移至西江,仅留三大舰在黄埔,则海军以势分而力弱,大舰或为逆军所买,则将来更难取胜.(二)以大本营一离黄埔,则长洲要塞必失,广州附近水性形势,尽入逆军范围之中,牵制更难,贼焰必张.(三)以总统移驻西江,其地面较广,活动虽易,然黄埔为广州咽喉,且有长洲要塞,其地点重要,非西江可比.且总统驻于黄埔,广州虽失,犹易恢复,威望仍在.如移西江,地势偏僻,无以系中外之望.(四)海军如往西江,重来省河较虽,如北伐军回粤,不能奏水陆夹攻之效.(五)移驻西江,而弃长洲天然之要塞,另谋陆上根据地,能否占领,尚不可知,且西江各部陆军,态度不明,能否为吾所用,尚未可必.如果陆上毫无根据,陆军又不奉命,则海军势绌,可立而待.有此五害,故动不如静,坚持北伐军速来,以备水陆夹攻省城,则贼亡有日也.”又说:“各舰由此出动西江,经道牛山,鱼珠之叛军炮台,又有三大舰已在沙路港口,监视我各舰行动,叛军炮台或可鼓勇冲过,而沙路港口之三舰,监视严密,其妨碍我行动,阻止我通过无疑.故我舰队此时惟有袭取车歪炮台,驶入省城之一策,其余皆非计也.”(注十一)这真是一个英明的指示及决策.民十三致蒋中正先生的亲笔信说:“闻仲恺说:械船到时,拟在金星门内起卸,以避耳目,我以为不必如此,若为避人耳目计,则金星门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门之对面,即伶仃关,该关有望楼,有缉艇,凡到金星门附近之船无一目了然,实在不能避,而反露我们欲规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舰之干涉.因英舰已视此等海面为其范围,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门外年年淤浅,此时之水路,当较数年前海图,必差数尺,恐致搁浅,此二不可也.又在该处搬运,实花费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风雨盗贼之危险,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来黄埔,公然起卸为妙.”当时依照此指示而行,果得安然起卸.足见国父的熟悉海上形势.又说:“好像外国的旧兵舰,从前如果是装了十二门大炮,便分成六个炮台,要瞄准放炮,打什么敌人,都是由许多炮手去分别执行,做指挥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现在的新兵船,要测量敌人的远近,在桅顶便有测量机,要瞄准放炮,在指挥官的房中,便有电机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敌人,不必要许多炮手去瞄准放炮,只要做指挥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测量机的报告,按距锥的速近,拨动电机.要用那一门炮,打那一方的敌人,或者是要十二门炮,同时瞄准,同时放炮,都可以如愿,都可以命中,像这种海军炮的使用,是叫做直接管理.”(“民权主义”第六讲)足见国父对于海军炮兵的研究.此外国父对于古代水战亦很注意,他说:“从前庄子说:“宋有善为不龟手之

药者，世世以泚澼絇为事，客问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之曰：“我世世为泚澼絇不过数百金，今一朝而鬻百金，请与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则与越人水战，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泚澼絇，则所用之异也。”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保护手在冬天不至破裂的那种药，宋人用之不适当，世世仅供漂布后涂手之用，吴人用之适当，使供水兵冬天耐战之用，而得一国。”（“国民要以人格救国”讲词）

前面说过国父自讨逆未果，乃离粤赴沪。可是国父于到沪之后，依然筹划讨陈事宜，不数月（十一年底），陈逆便为滇桂各军驱出广州，各将领见粤局稍定。乃电迎国父于十二年二月重返广州主持大计，惟此时陈逆仍盘据于惠州，国父认为“孔明欲出中原，先擒孟获，吾欲出长江，非先灭陈不可。”（注十二）遂于是年夏季，亲自督师东征，其经过情形有如下述：

国父为铲除陈逆炯明以除后患，乃决计亲征，设大本营于石龙。于八月廿三日乘大南洋轮船为座驾，十二时向东江进发，下午九时，抵达石龙。时天气奇熟，船复湫隘，所处之室，仅容一席，而国父居之泰然，按图握管，决策定计，昼夜不少息。及至许某某由博罗来谒，请示机宜，并谓逆军分三路来袭，李易标已抵距此二十里之汤村，敌将接近，不意帅座冒险来此也。时滇桂各军，已与陈逆激战数日，迄未得胜。廿五日，博罗方面，又告失败，林某即率逆军向石龙进犯。廿六日，博罗飞鹏岭失守，逆军占铜鼓岭等地。国父乃命飞机出发博罗，使守城者知有援应，并亲函许某某坚守，更命差舰载粮冒弹前进，以资接济，又电广州促援军急速来援，羽檄如雪片，而军行转缓，盖广州滇军待饷乃发，不问博罗被围之急与不急也。因之博罗之围，终不得解。廿七日，情势亦恶，及至深夜，尚不见援军之至，国父乃遣古应芬回省，催促滇军福军与吴铁城所部开进。李福琳即率所部偕朱培德赴前方，同时吴铁城部亦开抵增城。廿九日，国父由石龙向博罗前进，从礼村至苏村，沿途风雨急骤，船阻难行，甚至李福林、吴铁城两部负侦察任务之骑兵，均不得进，座驾小舟，颠簸动荡，势颇危险，然国父正襟危坐，策画军事，并以民元以前之革命史，昭示同行官佐，而披阅图籍，未尝一日辍也。卅一日，国父由铁冈泊池地抵松村，博罗时被围已久，守将刘震寰拼死坚持，城下水涨急，军不得近，仅以炮远射而已。适谭延闿入湘之军，由败转胜，捷报传来，国父喜形于色，乃命各军攻击前进。九月一日，

座船至第七碇，命福军滇军登山警戒，并饬副官于山颠燃火为号，使城内知主帅亲自来援。次日，国父亲登北岭，事事均躬为之，于致胡汉民书曾云：「吾今日兼尽一排长之职务，凡侦查敌情，考察地势，吾悉为之。」惟其时滇军大部份尚未集中，且骄不受命，国父不得已，重返石龙督促，虽许滇军禄国藩以重赏，而无效果，惮将骄兵，殊可恨也。三日，东路军所属师长张民达，与逆军战于淡水，大破之。四日，张至石龙捷报请训，国父命福军滇军分左右两翼进攻，滇军第四次要挟军饷未得，全军引退，止之无效。得南路邓本殷攻陷北海讯，国父命永丰舰往援。七日，许某某决突围，但以援军不克，早八时，福军与逆军大部接触，滇军田中毅，粤军张某某等部开雄鸡拍翼布阵。国父亲自登山督战，左翼福军，初犹小胜，及逆军大部冲进，福军退去，逆乃乘势闯进，沿义和墟而苏村，欲断福滇军之归路。是夜，退至石龙。八日，重进苏村，张部等会同福军，进攻义和墟之逆，破之。九日，国父由雄鸡拍翼至谭公庙，率属登山督战，各军奋勇分途追击，鏖战甚烈，自朝至午，进退数次，双方均有死伤。十日，博罗守军杨廷培，突围至铜鼓岭，逆军死伤枕籍，向派尾向水退却，博罗之围，乃得以解。国父即乘舰赴梅湖视察重炮兵阵地，以备进攻惠州。博罗之围解后，国父命福军及张部等分途追击，十一日，克平山。十二日，命飞机队往惠州城投弹。十三日，国父入梅湖，亲发重炮（由虎门运往之十五生的要塞炮）五弹，轰击陈逆所盘据之惠州城。次日返广州，得增城报捷讯。十八日，国父复至前方。二十日，至飞鹅岭筹攻惠州，上午十一时至炮兵阵地，被逆军发见，敌即不断发炮向国父射击，弹落身旁，距不寻丈，从者多为国父危，而国父但谕以无恐，并谓敌炮射程已止于此，纵密发，必不及。此种大无畏精神，与料敌之准确，军事专家叹为罕见。旋以事返梅湖，留程清等御敌，行至中途，忽闻爆炸声甚烈，后知白沙堆所泊电船自炸，飞机队长杨仙逸，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鱼雷局长谢铁良均遇难。廿一日，复至梅湖重炮阵地亲发六弹攻惠城。次日复攻，虽不破敌，逆胆已寒。廿三日午，合各军并进，作冲锋之搏击，战至二十四日拂晓，以鱼雷炸城基，飞机掷炸弹，亦不克。午后，逆军反攻死亡适巨，不支而退。十月卅一日，两军相战，互有胜负，刘震寰于是日退出飞鹅岭，十一月六日，国父恐博罗失守，重行出发亲征，激战之余，虽告胜利，而惠城仍然在逆军之手。八日，逆军倾巢而出，各军均受挫。九日国父急悬重赏，严督反攻，无如各军各顾地盘，不肯力战。十一日移大本营于石滩车站。十二日，逆军迫近石滩，被滇军击退，旋闻蒙兰，铁墙方面战急，讨逆军不支，国父即令新到之李根沅部沿广九路前进，不移时，闻战大败，

溃兵沿铁路纷奔，讹言四起。国父帅率古应芬，李烈钧等急下车制止，以图反攻。不料溃兵多不从命，向后纷退，车遂倒行，侍从秘书副官黄惠龙等乃强国父上车，旋改登机车，直开广州，而李烈均等已不及赶上，特另乘车到石滩布防。时逆军乘势尾随，几及石滩。然而范石生一闻败耗，不待炊毕，急奔赴援，大破之于石滩以东，逐逆军洪兆麟部于石龙。逆军之势乃稍戢，事后各路逆军复以重兵自广九路围迫广州，广州形势危急，不堪言状，国父仍本其大无畏之精神，坚持一兵一枪之奋鬪，又急电湘军豫军驰援，豫军樊钟秀部日夜兼程赶到广州，徒步出击破之，广州赖以保全。是役也，国父之危，不减于白鹅潭之役，而坚刚勇迈之气，视白鹅潭之役殆尤过之，从其役者，谈及此番战事，莫不神往。（注十三）

以上记载，自然不够详尽。虽说战鬪以歼灭敌人战鬪力，迅速获取胜利为旨，国父在这一役中，以八十余天的短期间，因陈逆凭据惠州的天险，及我方杂牌军队未能用命，致不克将其包围歼灭，却给予重大的消耗，并摧毁其鬪志，尤以国父亲临前线督战的精神，足以感召我全体革命将士，造成他日东江大捷的因素。就通例说，国父以大元帅的地位，五十有九的高龄，对于讨贼军事，本应坐镇后方的广州，遥用电话电报来指挥，却不顾一切险阻，毅然挺身到前线去，如设大本营于石龙，亲到炮兵阵地发炮轰击陈逆，及敌炮对其射击，弹落身傍，而不退避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实与拿破仑在法奥之役，举旗前进的精神，同出一辙。

此外，在此役中尚有两点，值得一述如下：

一、是披阅图籍：我们知道，不能判读地图，固然不配做指挥官，而地图又常为指挥官必携的工具，指挥官不能抛弃地图而指挥作战，正如航海者不能抛弃罗盘针而航行。否则，在战场上就变成瞎子，既不辨东西南北，也不辨地形地势，固不会適切地运用战略战术，更无从判断敌军的企图，位置与配备。国父对于舆图向极重视，民前十三年冬在日本曾自制中国地图，并在自跋中强调说：「萧何入关，先收图籍，所以能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卒佐汉高以成帝业者，多在此云。」据说：在这次东征中，常吩咐参谋秘书或亲自携带地图，到野外时，平铺地上，站着用争杖指点判读，并指示部属。在军营中，悬挂壁上，或平置桌上，用红蓝铅笔划出记号，以为指挥作战的根据。登山视察地形

时，用望远镜瞭望之后，又对照地图，判别有否差误，对图上所示路程的远近，山川的高低广狭，都能迅速计算出来。对于地图上一个很小地名，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注十四）。虽在督战时，一有余暇，便手不释卷，一种好学的精神，真为常人望尘莫及。考拿翁在作战时，他不论自己担任职务怎样重大，凡关于豫定战地，必先历史上和地图上仔细研究，并自行严密整理各种地图，出发时，在龙驹的革囊中常携带必要的地图和书籍，以精娴拿翁韬略的国父，也许受其应响。

二、是使用空军助战：空军的大量使用于战场上开始于第一次欧洲大战，从此战争的形态，便由平面变为立体，空军在现代战争上几取陆海军的地位而代之，没有拥着强大的空军，而被迫参加现代新型的战争，其吃亏将不堪设想。国父对空军的认识，在中国实为第一人，民元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任内，已设立航空队，并购「飞船」。（「覆黎元洪告已购飞船及各物电」）民六致南洋同志书说：「飞机为近世军用之最大利器」，并鼓励同志学习飞行，派遣同志到外国学习航空，提倡「航空救国」，及在广州大沙头设置航空局，有飞机六架，水上飞机一架，他说过：「像飞机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飞的，是经过许多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像大沙头的那般青年飞机师，从前不知道怎么样飞，只是请外国的技师来教，所以学到现在，便飞得很好。」（「国民奋鬪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讲词）国父在这次东征中，为导致战局于有利的形势，曾派空军到前方助战（注十五），虽说当时拥有的军用机连练习机仅有十余架，未能实行「杜黑主义」，使用强大的空军，协同地面部队，一举而歼灭逆军，且机上所装置的机关枪，系步兵使用的手机关枪，所投掷的炸弹，系改装的水雷或迫击炮弹，一切都是很幼稚的（注十六），但却可以看到国父已抛乘陈旧的平面战争的观念，踏上崭新的立体战争的大道了。于此应附带一说的：国父亦已从事于现代装甲部队的建设了，装甲部队以战车为主体，它具有优越的运动力、攻击力与防御力。而这号称为「地上雄狮」的战车，系出现于第一次欧战，并在战场上表演了惊人的奇迹。自此以后，各国竞相建立装甲部队，加以英国装甲部队理论家富勒将军的鼓吹，更使装甲部队的建设与空军的扩张，俱成为今日世界军事的两大主流。国父对于第一次欧战很有研究，对于欧美鼓吹建设装甲部队的理论，自必受其洗礼，所以在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之下，仍勉力设置一个「甲车队」，设计者为擅长甲车战术的俄国顾问李縻君（注十七），虽说这个甲车队亦同飞机队一样的幼稚，使用于铁路上的改装钢甲火车（据说使用于广九、广三、粤

汉铁路上收效颇大)，使用于公路马路上的改装铁甲汽车，均为数无几，及拥有的坦克两辆尚在试验中（注十八），但此举却开了中国装甲部队建设的先河。我们今后的建军，应澈底地接受国父这两个伟大的遗规吧！

还有：国父于同盟会时代的一九〇五年，亲订军事规章：「军政府与各处民军关系条例」，「军队之编制」、「将官之等级」、「军饷」、「战士赏恤」、「军律」、「招军章程」、「略地规则」和「因粮规则」等。于中华革命党时代的一九一四年，又亲订有：「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内分「军政府」、「限制勋纪」，「军律军法」，「因粮征发及其他则例」等，其中大部份亦属于军事规章，从这些规章看来，非对于兵学及军事法规素有研究，曷克臻此。其次是国父鉴于历次革命的失败及苏俄建军的成绩，以为今后欲扫除国内反革命势力，尤其为巩固中国国防及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决不是利用乌合之众的民军，可以成事，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缺乏战鬪的能力，也不是利用旧军阀的武力，所可济事，因为旧军阀以争权夺利为目的，不听命令，不守纪律，随时可以干起反革命的勾当来，像陈炯明、陆荣廷、沈鸿英之流，何莫非一度投机参加革命，但终变成与革命为敌的反动军阀。所以非从新建设强大的革命武力不可，尤非从新养成大批新革命干部不可，这便是国父设立黄埔军官学校。（原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原因。国父为设立这个军官学校，于民十三年派蒋中正、廖仲恺两先生负责筹备，旋任蒋氏为校长，廖氏为党代表。开学之日，国父亲临致训，勸勉全体学生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从此积极训练，一面授以军事学术，一面施以政治训练，因而养成无数革命的干部，在现代中国建军史上写上最光荣的一页。

西人论将帅的条件：「一曰无畏的大勇，二曰创造的智慧，三曰强健的体魄。」德国名将鲁登道夫也说过：「主帅的地位，应为第一等艰辛，第一等天才，第一等坚强意志。」国父实足以当之而无愧。国父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武合一的大人物，也是现代一个智仁勇兼全之天才的大军事家！

- (注一)波亚 (Boers) 人为荷兰农民移殖南菲，分居杜兰斯亚及阿伦治自由邦，国父在「钱币革命通电」中所称「杜阿二国」，即指此。在「军人精神教育」中所称「杜国」即指杜兰斯亚。在「民权主义」里所称：「波人」，即波亚人。

- (注二) 堪玛利将军 Homerlea (976—1012) 美国军事专家, 著有「无知的勇气」一书, 风行各国。与国父结识于三藩市, 共同研究军事, 旋与国父经欧来华, 曾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 国父誉为「天下最杰出军事家」。
- (注三) 据冯自由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七月由渝给我的信。
- (注四)、(注五)、(注十四) 及(注十六) 据李仙根先生口述。
- (注六) 据胡毅生先生(是役参加者)口述, 修正坊本记述写成。
- (注七) 据张先生口述。
- (注八) 及(注十一) 见蒋中正先生着:「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 国父语。
- (注十) 据张溥泉先生口述。
- (注十一) 见邹海滨先生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 国父语。
- (注十三) 参照胡去非编纂:「总理事略」第十一草六十节写成, 并承参与是役两位老同志校正。因该文据古应芬著:「孙大元帅东征日记」写成, 而古着与事实略有出入。
- (注十五) 据国父促工业速办攻惠军需书说:「新飞机日内可到, 必照应着航空局赶将飞机配好, 赶来前敌应用。」
- (注十七) 国父致蒋中正先生函云:「前李縻将军要取手机枪拾八枝, 为配甲车之用, 务要照发。……李君专长甲车战术, 一切须由其配备乃能灵捷, 且敌人已来窥翁源、河头, 欲断我省韶铁路之交通, 我日内往韶关, 则此铁路之防备更为急要。」
- (注十八) 据赵超先生口述。

参考书:

胡汉民先生编:「总理全集」, 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总理全书」, 吴秩晖先生着:「总理行谊」, 张其均先生着:「党史概要」, 冯自由先生着:「革命逸史」, 陆辑:「孙中山先生外集」, 中宣部编:「国父孙中山先生年谱」等书, 及克劳塞维慈「战争论」, 鲁登道夫「全体性战争」, 拙作「孙子兵法新研究」等书, 又, 本书全文所参考书籍达一百二十种, 论文二百十五篇, 为节约篇幅, 未能尽录, 合并声明。